

# 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中国经验

##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两种读后

任小波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要:** 此文对《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的学术价值作了综论, 特就中国老一辈学者在敦煌藏学领域的持守精神和学术优长给予表彰, 同时结合西方学者的研究路径和进展对这两卷书的特色和内容作了评述, 进而对中国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现状与未来提出些许思考。

**关键词:** 敦煌藏文写本 敦煌吐蕃文献选辑 敦煌藏学 中国经验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2)01-0169-12

2011年六七月间, 郑炳林、黄维忠先生所主编的《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 作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吐蕃文献丛书”中的两种, 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这两卷书, 系统地荟萃了两代中国学者数十年来的相关成果, 堪称是对国内的既有研究作有规模的专题性整理的开端。早在1985年, 王尧、陈践先生便已提出分类编纂《敦煌吐蕃文书集成》的目标。<sup>①</sup>然而长期以来, 这一设想并未在国内取得切实的推进。郑、黄二位先生筹划这套《选辑》约在2006年前后, 本着分类结集、突出专题、重视录译、方便利用的原则(《〈敦煌吐蕃文献丛书〉编纂缘起》, 第1页), 代表了国内敦煌藏学研究“整理国故, 预流国际”的时代要求。近年以来, 在国际敦煌藏学研究领域, 专题性的整理和综合性的阐释业已形成显著的趋向。这种趋向的出现, 实乃总结研究积淀、拓展学术视野二者合力推动的结果。日本学者所主导的“古藏文文献在线”项目,<sup>②</sup>有益地借鉴了拉露(M. Lalou)所开创的写本整理方法, 在研究信息的统合、拉丁录文的处理、网络工具的开发等方面成绩瞩目。2007年, “古藏文文献在线丛刊”(OTDO Monograph Series)卷I《法英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 由东

收稿日期: 2011-10-09

作者简介: 任小波(1981-), 男, 陕西商州人。在站博士后, 讲师, 主要从事敦煌藏文文献研究。

① 王尧、陈践《回顾与前瞻——记中央民族学院的敦煌吐蕃学研究所》, 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第3集,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85年, 第67页。

② <http://otdo.aa.tufs.ac.jp/>.

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ILCAA) 刊行。<sup>①</sup> 作为日本学者整理古藏文文献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 此书及其网络版是继《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选集》<sup>②</sup> 出版以来, 国际敦煌学界在藏文写本整理领域的又一标志性收获。国内、国外学界的这种不约而同的契合, 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学术进步的客观要求。

中国的敦煌藏文写本研究, 目前正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卓有成就的老一辈学者大都年事已高、隐在林下, 然而富有学养、较成规模的新生研究力量尚未丰盈。水平参差的研究成果大多分散刊布, 其中不乏查考未周甚至重复劳动的论著, 有份量的整理和系统性的总结进展迟滞。2002年, 王尧先生发表《从敦煌文献看吐蕃文化》<sup>③</sup>一文, 总括性地提出了中国学者视野下的敦煌藏文写本的分类谱系, 并在各个类目之下释例性地举证了相关写本的译文及其价值。这篇论文, 可以说凝结了老一辈学者数十年的研究经验和思考, 至今仍是在学理层面为数不多的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作品。此外的各类研究报道或综述, 固然有其发布学术进展、汇集学术信息的功德, 然而能将研究实践与学理思考并举者实在不多。这种状况, 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国内敦煌藏学研究质量的提升。敦煌藏文写本的数量占据所谓“胡语文献”的大宗, 中国学者又具备深入研修藏文的优势条件。然就敦煌胡语研究的国际格局而言, 诚如“丛书”编委之一的高田时雄先生所言, “目前中国学者的贡献还很有限”。<sup>④</sup> 个中原因, 可能既有研究视野和学术水准的问题, 也有交流渠道乃至学术话语的因素。对于前者, 笔者将在下文有所述评。至于后者, 兹可略举一例加以说明。仅观“古藏文文献在线”(OTDO) 中的 References 一项, 不少可以代表中国学者研究水准的论著并未受到关注, 而国内的某些不能通检藏文者的外围论著却赫然在列。因此这份清单, 当然不足以反映中国学者的实际研究能量。而今,《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所收内容, 概皆经过陈践先生的把关和统编, 汇集了总体经得起推敲的旧成果和新研究, 自能起到正本清源、树立标杆的积极作用。

东噶·洛桑赤列 (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 活佛在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所撰的藏文前言中, 曾经热情洋溢地将敦煌藏文写本的文献价值比作珍贵的“金滴”(gser gyi thigs pa),<sup>⑤</sup> 实则对于写本转录和译释的精准程度提出了极高的期许。敦煌藏文写本研究“解题—录文—汉译”附以注释的基本模式, 是中国现代藏学的开拓者于道泉先生深为提倡的研究方法。这套方法, 得到于先生一干弟子的坚持和传承, 已

① Y. Imaeda, T. Takeuchi et al. eds., *Tibetan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Kept at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and the British Library*, Tokyo: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07.

② A. Macdonald, Y. Imaeda et al. eds., *Choix de Documents Tibétains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Complété par Quelques Manuscrits de l'India Office et du British Museum*, Tmes I—IV,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Tokyo: ILCAA, Université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de Tokyo, 1978, 1979, 1990, 2001.

③ 黄征主编《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与敦煌学》,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2年, 第211—242页。

④ 黄晓峰采访《高田时雄谈敦煌学》,《东方早报》2009年2月22日, 第B02版。

⑤ 王尧、陈践译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前言(vgo brjod)》, 民族出版社, 1992年, 第4页。

经明确地反映在《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的篇次结构上。解题部分，或详或略地概括了文书的基本信息。而最有价值者，显然是在录、译两个方面。这两卷书的录文，全部依据原本图片重订而成，多以行间括弧的形式标出补阙的内容或相应的正字，必要时则视情况另作脚注或尾注。录文排印直接使用藏文原文，较之拉丁转写更能反映原本的实态。黄维忠先生在统编过程中，务求尽量统一体例而又不伤原作风貌。对于同一写本的几种译文，采用兼收并蓄、各表一枝的方案，为读者架设了判断、取舍和思考的空间。其中的绝大部分译文，还送请初译者作了重订。比照阅读起来，深感这种字斟句酌的功力无形地隐在字里行间。总体翻检之下，有关卷号的研究成果、译者的研究面向皆可一目了然。书末附有写本的黑白图版，绝大部分影印效果颇好。其中部分图片，可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sup>①</sup>查检或下载。其中部分卷号，可从“古藏文文献在线”看到转写并进行检索。仅就笔者细阅过的几个卷号而言，日本学者录文的精准度基本值得信赖。

还有必要提及，《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的封面剪影取自 ITJ 731 号和 ITJ 738 号，前者几乎是迄今所知敦煌藏文写本中最古老的篇章。其中 ITJ 731. I 号《家马与野马的分化》（*rTa rgyang dbye bavi rabs*），实为一则作为宗教先例（*dpe srol*）的丧葬仪轨故事（*cho rabs*）。其所存在的十分密集的语词译解上的难点，集中反映了此卷在年代背景上的古老渊源。譬如第 r99 等行，*rta*、*rmang* 二词彼此互文，在语境中均指“马”而言。关于藏语 *rmang*（马）与缅语 *mràng*（马）之间的语源关系，以及 *rm* - < \* *mr* - 的换位规律问题，西方学者已经通过相关语料，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说。<sup>②</sup> 然而此词在汉文典籍中的存在，自非西方古藏文研究者之所长。根据闻宥先生考订，汉文《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无雍梁林”当为“雍无梁林”（雍閬系马之林）之讹，明同文堂钞本和东洋文库藏本《缅甸馆杂字》以汉字“麦浪”作为“马”的标音，其中“无梁”、“麦浪”二词均可比拟为缅语 *mràng*。<sup>③</sup> 仅此一词之证，已经初显这件写本中深远的文化信息。再如第 r104 行 *gor*（< *sgor*，旋转）、*dro*（< *bro*，舞蹈）二词，就其语境和语义的所指而言，当是迄今所知有关藏族“锅庄”（*sgor bro*，圆舞）的最早文献依据。毫无疑问，ITJ 731 号当是最能检验研究者的古藏文水平的文献之一。如若精读全卷，其中足以令人产生多重联想的语词频繁出现。谢后芳先生对于全卷的汉译和注释，此次作为“文学卷”的首篇得以公布，为年轻一辈学者循径攀升、继续研讨提供了所依。着实来讲，关于此卷之内多重隐喻的交叉状态，以及故事情节与仪轨程式的结构关系，学界至今未能给出通透的诠释。这份文献依然以其经久的魅力，吸引着善巧的学者

① <http://idp.nlc.gov.cn/>.

② W. South Coblin, “An Early Tibetan Word for ‘Hor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94, No. 1, 1974, pp. 124 - 125; C. I. Beckwith ed., *Medieval Tibeto - Burman Languages*, Leiden - Boston - Köln: E. J. Brill, 2002, pp. 129 - 132, 149.

③ 闻宥《语源丛考·“雍无梁林”解》，《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 4 期，第 146 - 148 页。

继续探究和阐扬。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内敦煌学、吐蕃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以王尧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对敦煌藏文写本的译释。尤其王尧、陈践先生合作完成的三部著作(《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吐蕃文献选》、《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以及系列论文,对于职官制度、社会经济、民族关系乃至律例、伦理、占卜、宗教、译作、医学等方面的藏文写本进行了通盘研究,可以说触及了吐蕃历史文化的的所有主要方面。就在近年,王尧先生复又借用顾炎武的著书之论,富有历史感地忆及当初立志此项研究的心境“必前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sup>①</sup>译释这一卷卷尘封已久、晦涩难解的古藏文写本,要求学者须有“思古之幽情”和“理解之同情”,宏通的学养和地道的语文二者缺一不可。综观《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所收篇目,大多出自王尧、陈践、谢后芳、罗秉芬、黄布凡等老一辈学者的译笔。他们在知识结构上的一大优长即是“学行相应”,他们的藏语文素养是在西藏“熟悉生活,培养感情”的苦乐所得。<sup>②</sup>较之老一辈学者对西藏语言文化的切身体察,年轻一辈学者显然尚待进一步锤炼。这种客观的感性体察,在研究中常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譬如“文学卷”所收 ITJ 730号《松巴谚语》第16-18行,中有 khrel myed ngan pa la ni/ nye rIng myed la// khyi spyang ltogs pa la mtshos rjen myed do//、mo ngan gi sris nI/ kha btag ngu btog la zad do/两句。陈践先生即是借鉴安多(A mdo)方言对其重新释读,分别译作“无耻坏人不存亲疏,饥饿狼狗不分生熟”、“坏女人之伎俩,亲嘴夺银而已”(《文学卷》,第100-101页)。较之托玛斯(F. W. Thomas)的旧译,这种译法的殊胜之处读者自可领略。

在国际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园圃中,《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所收内容,反映了中国学者在相应领域的主要业绩和研究取向。其中虽也不乏对国外研究的关注和借鉴,但可以说承载着地地道道的“中国经验”。虽也不乏年轻一辈学者的优秀译作,但老一辈学者的治学经历和收获给人印象尤深——庶几可用“功力深沉,收获可观”八字加以概括。笔者曾有幸参与这两卷书的局部编辑工作,深为这些先生们老骥伏枥、惟日孜孜的热诚所感。他们竭尽可能地提供资料、改订旧文、撰写新论,将长期研究的积淀和近期所得的涓滴一并奉献给读者。他们的研究兴趣和侧重各有不同,在语文释读方面亦互有优长,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其弟子一辈。如上两代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经验传承,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发扬。然而照实来讲,这份经验传承既是财富又是成规。对于中国经验和西方路径的切实关照和有机兼容,恐怕应是年轻一辈学者应当着力进取的目标。2010年,迈凯文(A. P. McKeown)所编译的《吐蕃文献丛考》<sup>③</sup>一书

① 王尧《〈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三版前言》,王尧、陈践《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罗秉芬《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藏语班》,《中国西藏》2011年第6期,第52-55页。

③ A. P. McKeown tr. & ed., *Rolf Stein's Tibetica Antiqua, with Additional Materials*,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10.

的出版,标志着石泰安(R. A. Stein)于1983-1992年所撰的6篇《吐蕃文献集释》(*Tibetica Antiqua*),终以英文译文的新貌获得重订和结集。石泰安先生关于敦煌藏文写本的这组精湛的研究,至今仍是国际敦煌藏学界不能忽略的体大思精之作。较之这种饱满的综合性探索的气度和成就,中国绝大部分学者还是基本停留在分卷译释的层面。近年以来,对于在国际学界蔚为风气的古藏文文书学(codicology)和类型学(typology)研究,<sup>①</sup>中国学者已经有所体察并开始自觉践行。<sup>②</sup>事实表明,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分卷研究思路和成果的统合颇具积极意义。以下仅以“文化卷”和“文学卷”所收为限,特就中国学者成就最为显著的两个方面,结合相关的研究进展或趋向略作述评。

其一,关于各类占卜文书。

“文化卷”所收10份占卜文书,是中国学者收获最集中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尧、陈践先生合作完成了译释PT 1047和1055号、PT 1045号、ITJ 738号写本的“三探”,这是国内学者自觉地探索敦煌藏文占卜文书的起点。王、陈二位先生1985年刊出关于PT 1045号鸟卜文书的论文,<sup>③</sup>上距劳费尔(B. Lauffer)1914年发表关于此卷的考释已经过去整整70年。当二位先生重将目光投向劳费尔这篇被称为“绝响”的古典作品时,正值中国敦煌藏文写本研究意态萌动、方兴未艾之际。关于占卜文书的研究,实为陈践先生兴趣最大、持续最久的研究课题。近些年来,她几乎将自己先前的多种旧译全部作了重订,并将此前未及寓目或不曾获得的写本搜罗殆尽。此次她又将长期的经验和思考谱成新篇,名曰《敦煌藏文占卜文书述略》,作为“文化卷”占卜部分的总说。此文涉及敦煌藏文占卜文书的绝大部分卷号,并结合有关的藏汉文史籍加以比照,堪称一篇持论平实、重视类例、译文准确的研究导论。尤其对于语词文化背景的解说,体现出一种举重若轻的从容和娴熟。在占卜文书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的积淀确实到了需要整合提升的时候。

PT 1047号《羊胛骨卜》,是敦煌写本中最长的一件藏文占卜文书,也是惟一明确涉及吐蕃官方卜辞的敦煌藏文文献。读者若将“文化卷”中的新译(《文化卷》,第34-42页)与早先的初译<sup>④</sup>加以比较,方能真正体会王尧、陈践先生20余年间释读此卷的执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条卜辞之下几乎均有理解的变动或文辞的更改。关于羊胛骨卜的基本原理,东噶·洛桑赤列活佛和木雅贡布(Mi nyag mgon po)先生,已经给出了符合藏区实际的解说。然而卷内卦象问题,长期以来未能破解。就在“文化卷”出版不久,陈践先生借鉴纳西族东巴经中的类似文本,成功地释读了有关卦象的语词的

① C. A. Scherrer-Schaub & G. Bonani “Establishing a Typology of the Old Tibetan Manuscripts: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S. Whitfield ed.,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184-215.

② 巴桑旺堆《关于古藏文写本的研究方法的再探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第61-81页。

③ 王尧、陈践《吐蕃的鸟卜研究——伯字1045号卷子译解》,中央民族学院藏族研究所编《藏学研究文集》第3集,第249-257页。

④ 王尧、陈践《敦煌吐蕃文书论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79-92页。

所指(纹路、方向)。疑云一朝得以涣然冰释,PT 1047号的卜法终于得到了彻底通解。此卷以及ITJ 740号之中那些曾被疑为“象雄语”的卜辞,终于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关于敦煌写本与东巴文献的沟通,西方学者萨勒斯(A. de Sales)早已有所提及和论述。<sup>①</sup>近年以来,国内外所藏的东巴古籍开始得到系统整理出版,这为敦煌藏文写本的释读提供了可贵的比较材料。前述PT 1045号《乌鸣占卜表格》,不仅敦煌汉文文书中存在与其相同内涵的写本,而且东巴经《以乌鸦叫声占卜》<sup>②</sup>在类型上也与之惊人地一致。据称彝族毕摩经之中,亦有与此相似的占卜文献。除此之外,“文学卷”中的ITJ 731号《丧葬仪轨》、ITJ 734号《招魂仪轨》,均可在东巴经中觅得整篇对应或语段从同的内容。敦煌藏文写本对于西北民族研究的意义固然不必赘言,而其与西南民族的文化生态关系亟待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

ITJ 738号《骰卜文书》中被译者称作“短偈”的签句,饶宗颐先生实已指出其与汉地的“繇辞”相类。<sup>③</sup>这些繇辞与相应的卦式和卦辞彼此紧扣,而且具有古奥清新、颇富韵律的文学意境,故而被同时收入“文化卷”和“文学卷”内。对于此卷第31-34、37-38行的繇辞,陈践先生已经揭示出其与PT 1051号第52-55、59-60行的段落组装关系(《文化卷》,第5-6、90-91页)。对于两个写本的比较研究,显然还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另外一件ITJ 740. I号《骰卜文书》,与ITJ 740. II号写本接抄于一纸之上。后者具有鲜明的法律内涵,故而“文化卷”占卜部分暂时未予录译。然而后者首题中的sho tshigs一词,似应就是用于指示骰点涵义的“泉词”,其在法律审判中常被作为神明裁断。2007年,多特森(B. Dotson)发表《吐蕃帝国的占卜与法律:论骰子在借贷、利率、婚姻和征兵中的法律功能》<sup>④</sup>一文,对ITJ 740号所包含的两种文书的内涵作了通贯的考察,这种将占卜术与社会史相联结的研究思路着实有趣。值得注意的是,ITJ 740. II号中的kha [d]mar(凹槽木牍)、myig [d]mar(圆孔木牍)二词,甚至令人联想到ITJ 750号《吐蕃大事纪年》第9行dmar pho(红册、简牍)的功能。这一线索,或许对于吐蕃简牍形制的研究具有参照意义。国内关于占卜文书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录文和汉译两个层面。欲使相关研究获得充实和推进,除应重视诸如多特森论文所采用的社会史路径之外,广义的思想史乃至文化史的诠释作用显然不可低估。

PT 1055号《铜钱占卜》(94行),与ITJ 744号(29行)实际可以缀合。2011年,

① A. de Sales “Magar Songs, Naxi Pictograms and Dunhuang Texts”, P. Kvaerne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Vol. II, Osl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1994, pp. 682-695.

② 东巴文化研究所编《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第99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1-351页。

③ 饶宗颐《饶序》,王尧、陈践《吐蕃时期的占卜研究——敦煌藏文写卷译释》,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vii页。

④ B. Dotson “Divination and Law in the Tibetan Empire: The Role of Dice in the Legislation of Loans, Interest, Marital Law and Troop Conscription”, M. T. Kapstein & B. Dotson eds.,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Early Tibet*, Leiden-Boston: E. J. Brill, 2007, pp. 3-77.

西田爱译释 ITJ 742 号钱卜文书的论文对此已有说明。<sup>①</sup> ITJ 744 号第 4 行“若铜子十二枚皆为文”(dong tse bcu gnyls ril gan na/)、第 14 行“若铜子皆为曼”(dong tse ril bub na/) 二句, 确然昭示了这类钱卜所用卦具的数量, 为研究其与敦煌汉文 S 3724 等号《十二钱卜法》的异同提供了依据。“文化卷”在今后修订时, 可将 ITJ 744 号写本增补进去, 形成一份铜钱卜辞的完璧。至于 PT 351 号占卜文书, 同时具有景教的背景和佛教的因素。其中第 40 行 I shi Myi shi ha (<Jesus Messiah, 耶稣弥赛亚), 即是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序听迷诗所经》中的“移鼠迷师诃”。此卷的文本功能, 显然是藉佛教的话语宣明耶稣的神力, 因此学界通常将其称作“景教卜辞”。此卷所使用的卦具至今不明, 故而“文化卷”亦未给出拟题。2011 年, 刘勇先生刊布了一叶出自西藏山南的偈体古藏文写本, 题名《犬相经》(*Khyi vi mtshan nyid bstan pa*)。<sup>②</sup> 这件貌似佛典的所谓“外道”文献, 实为一件依据“犬相”进行占卜的文书。其内容与 P 3106 号汉文写本中的“犬占”部分颇为类似, 或可据以拉近古藏文写本与汉文占怪文献的距离。这件《犬相经》的发现, 提供了又一有趣的占卜类型。此外还须指出, PT 127. I 号《生肖命相》、PT 127. II 号《时日宜忌》, 实际上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占卜文书”, 而是具有深厚的汉地数术文化背景的实用历算文献。

其二, 关于丧葬仪轨文书。

“文化卷”所收 PT 1042 号、PT 239. I & ITJ 504 号《丧葬仪轨》, 实际是由褚俊杰先生的两篇著名论文<sup>③</sup>改订而来, 此次重刊又对录文作了全面的厘定。褚文以其对拉露、石泰安等西方硕学研究成果的全面借鉴, 以及对丰厚的背景文献和大量的比较材料的精细处理, 堪称中国学者在那个年代所撰的足以屹立于国际学林的作品, 至今仍代表着藏文丧葬仪轨文书研究的世界水准。2010 年, 石川巖发表了对于 PT 239. I 号的日文译注,<sup>④</sup> 实际并未超越褚文所触及的论题。石川论文的一个新意, 是以录文的形式揭示了 ITJ 493 号的性质, 此号与 ITJ 504 号同为 PT 239. I 号的异本断片。“文化卷”的排定是在 2009 年, 故而未及吸收这一必要信息。于此还应指出, 托玛斯所著《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sup>⑤</sup> 一书中译释的 6 件敦煌藏文写本, 即有 4 件明确属于丧葬仪轨范畴。20 世

① A. Nishida “An Old Tibetan Divination with Coins: IOL Tib J 742”, Y. Imaeda, M. T. Kapstein & T. Takeuchi eds., *New Studies of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s: Philology, History and Religion*, Tokyo: ILCA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1, pp. 315–316.

② 刘勇《关于古藏文文献〈释犬相〉(*Khyi vi mtshan nyid bstan pa*) 的解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12 期, 第 57–59 页。

③ 褚俊杰《吐蕃苯教丧葬仪轨研究——敦煌古藏文写卷 P. T. 1042 解读》,《中国藏学》1989 年第 3–4 期, 第 15–34 页, 第 118–134、49 页 《论苯教丧葬仪轨的佛教化——敦煌古藏文写卷 P. T. 239 解读》,《西藏研究》1990 年第 1 期, 第 45–69 页。

④ 石川巖《敦煌チベット語文獻 P. T. 239 表訳注——古代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前仏教的葬儀とその仏教化に関する一証言》, 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 3 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年, 第 55–74 页。

⑤ F. W. Thomas, *Ancient Folk – Literature from North – Eastern Tibet*, Berlin: Academia – Verlag, 1957.

纪80年代初期,谢后芳先生根据托玛斯的拉丁转写,完成了对这批写本的重译。然而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仅选刊过译稿中的少量文字。后经陈践先生热情联络,获得在伦敦访学的牛宏博士的帮助,终于搜齐了写本的全部图片。谢先生据以改定形成的译稿,此次全部收入“文学卷”中。老一辈学者孤悬30余年的心血,经此机缘终以崭新的面貌表露于世,实在是一件值得表彰的盛事。

PT 239. I号中的《良马回向》(*rTa sngos ba*)第v10.3-12.3行,记有观音菩萨化现为方便马王(*thabs gyI rta vI rgyal po*)救助商主一行脱离苦海的情节。这一故事源出《宝篋庄严经》(*Kāraṇḍavyūha sūtra, mDo za ma tog bkod pa*),后以不同形态被收入《玛尼全集》(*Ma ṇi bkav vbun*)、《笃布巴本生传》(*Dol po bavi skye rabs*)、<sup>①</sup>《西藏王统记》(*rGyal rabs gsal bavi me long*)中。根据后弘期藏文史籍,《宝篋庄严经》于拉托托日年赞(*lHa tho tho ri snyan btsan*)时期作为“玄秘灵物”(*gnyan po gsang ba*)进入吐蕃,向被视作最早传入雪域西藏的一部佛典。此经与PT 239. I号以及如上几种藏文史传一起,实际上形成一个前后相继、有所承变的文本序列。对其进行综合的语文厘定和比较研究,可为考察西藏史学体例及其宗教意向的前后脉络、西藏观音信仰与政教文化的结构关系,提供有趣的文本依据和思想素材。迄今为止,学界仍还仅限于将PT 239. I号视作佛教化的丧葬仪轨,<sup>②</sup>依旧停留在所谓“西藏被佛教化”或“佛教被西藏化”的认知模式中,而对此卷承上启下的文本中介价值极少关切。此外还须指出,PT 239. I号与PT 239. II号抄于同一纸张的正反两面,不仅笔迹相似而且内容风格一致。后者所载《天界道示》(*lHa yul du lam bstan pa*),可与PT 37. III号《亡者天界净土道示》(*gShin va lha yul gtshang sar lam bstan*)同定。<sup>③</sup>颇为有趣的是,PT 239. II号中的tshe vdas pa khyod(亡故者您),在PT 37. III号中皆被换作tshe dang ldan pa khyod(具寿者您)。这类仪轨文书的流通途径及其思想状态,还有结合其实际功能作继续探究的可能。

PT 1042号写本在丧葬仪轨文书中具有独特价值,后续研究一再验证和丰富着拉露关于此卷王室性质的推定。褚俊杰先生当年延续哈尔(E. Haarh)的研究路径,对卷内的“三年丧期”问题作了颇为周详的判断。现在看来,这一判断可在更广泛的文本联系中再向前推进一步。仅就笔者阅读所及,相关内容线索如下:第143-145行,王妃(*mo btsun*)的丧葬仪轨与死者略同,只是用作法事的动物被换作牝畜;第134-137行,身为新君的幼子(*thugs bu chung*),亲自前往陵墓的享堂参加祭奠活动;第140-143行,某位出身尚族的舅臣(*zhang lon*),特在朵麦(*mDo smad*)地区主持吊唁仪式。

① 陈庆英《元代西藏的传记文学的精品——〈笃布巴本生传〉》,《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5页。

② S. van Shaik, “The Tibetan Avalokiteśvara Cult in the Ten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R. M. Davidson & C. K. Wedemeyer eds., *Tibeta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Praxis, Studies in Its Formative Period, 900-1400*, Leiden-Boston: E. J. Brill, 2006, pp. 58, 70.

③ 才让《法藏敦煌藏文佛教文献P. T. 37号译释》,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25-231页。



种种蛛丝马迹的重叠，实际已将亡者的身份指向莽松莽赞（Mang srong mang btsan，650–676 年在位）。那位新君，或许正是莽松莽赞的遗腹子、此时年甫 4 岁的墀都松（Khri vdus srong，676–704 年在位）；那位舅臣，或许便是参与 678 年唐蕃青海之战、统兵于吐谷浑故地的某位边将。于此还应指出，“文学卷”所收 PT 126. II 号《穆王与恰使的问答》，实际亦与王室丧葬仪轨存在密切关联。根据此卷第 156–159 行，恰（Phywa）族使者在穆（dMu）族国王面前承诺，将会遵循齐乌仓（Byevu ts-hang，鸟巢）地方的王家殡葬（rgyal gshegs pa）传统。这段文字，涉及丧葬中的“替身”（glud）仪轨以及意为“寒冷”的 Grang mo 一词。关于 Grang mo 的所指，褚俊杰先生推测其为“墓室”（《文学卷》，第 229 页）。新近研究表明，此词在文本和口碑中均系一地名，位于琼结（vPhyongs rgyas）以南的彰瓦（Grang ba，= Grang mo grang chung）地方。<sup>①</sup> 根据田野调查，此地的确存在不少年代久远的墓葬遗存。

ITJ 734 号《招魂仪轨》，亦是一件年代背景相当古老的文献。根据此卷第 7r292–8r351 行，包括雅齐索雅（Yar khyim sogs yar，雅隆）、甲域丹桑（rGya yul gdan bzangs，汉地）在内的 14 个平行的地域，均流行苯教祭司（gshen）在丧葬中“向魔鬼抛替身”（srin la [sku] gludu bor）的仪轨。对于此卷所涉及的区域，谢后芳先生已经初步揭示出其与 PT 1286 号《吐蕃邦伯家臣表》所载十二小邦（rgyal phran）的异同关系（《文学卷》，第 56–58 页）。除此之外，PT 1060、PT 1285、PT 1289 号苯教仪轨文书，均涉及吐蕃小邦的简要历史。PT 1290 号《吐蕃邦伯家臣表》，实为 PT 1286 号的一种别本。西藏噶塘（dGav thang）文书中的地理资料，亦与十二小邦存在对应或出入。尤其莫高窟北区所出 B 147：24 号写本，乃是一件难得的吐蕃地志残片，<sup>②</sup> 其中某些地名可与如上写本相勘同。若对以上材料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充分重视地望异同及其层次关系，并结合后弘期藏文史籍加以考订，那么对于吐蕃早期地理的认知将会颇有改观。关于吐蕃历史地理的研究，在国际范围内仍是一个薄弱环节。2009 年，多特森（B. Dotson）所著《古代西藏纪年》一书，对 PT 1288 + ITJ 750 & Or 8212/187 号《吐蕃大事纪年》作了最新研究。较之以往诸家的相关研究积累，此书文献译注部分并无多大推进。然而书末所附由哈佐德（G. Hazod）编制的详尽地理图释，<sup>③</sup> 则堪称是近年以来稀见的吐蕃史地研究的可贵成就。此外还应提及，ITJ 734 号第 5r199–6r228 行所记弥门布琼（Myi

① G. Hazod, “The Grave on the ‘Cool Plan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Tibet’s ‘First Tomb’ in Nga-ra-thang of ‘Phyong-po’”, B. Kellner, H. Krasser, H. Lasic, M. T. Much & H. Tauscher eds., *Pramāṇakīrti: Papers Dedicated to E. Steinkellner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 Vol. I,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2007, pp. 269–272, figs. 3a–b.

② 彭金章主编《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研究》下册，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1 年，第 533–535 页，图版 40–41。

③ B. Dotson,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by G. Hazod*,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Part III, pp. 161–231.

smon bu chung) 的还魂故事,甚至可以在现代西藏口传文学中找到类似的情节乃至相同的语句。仅此冰山一角,已经凸显出这件写本不容低估的研究价值。

除过占卜文书、仪轨文书两个方面之外,《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对其他写本亦有收载,以下仅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卷号为例略作述评。

“文化卷”所收 PT 986 号《〈尚书〉译文》,集中地体现了唐蕃文化的交流深度。此卷第 9 行 stams las bcad pa、第 60 行 ngo vphral 二词,根据汉藏文本的互训理当释作“加以残害”、“建立战功”(《文化卷》,第 209、210 页)。这为《谐拉康甲碑》第 35 行 stams las chad、PT 1283. I 号《礼仪问答》第 431 行 ngo vphral 的所指,提供了最为直接并合乎语境的解答。据此看来,将 stams las chad (= stams las chad) 释作“申诉”、将 ngo phral (< ngo vphral) 释作“现在”的解读方案,<sup>①</sup> 还有必要依据更多的文本用例重新考量。1991 年,柯蔚南 (W. South Coblin) 对于 PT 986 号作了迄今为止最称精详的译释。<sup>②</sup> 即便如此,相关研究并未到了彻底穷尽的地步,譬如柯氏对于 ngo vphral 等词的释读显然不够惬意。此卷的语料价值和文化信息,实应得到更充分的关注和利用。柯氏在其研究古藏文写本和碑铭的一系列论著中,始终坚持李方桂先生所倡导的“文本厘定—逐字译文—语词索引”的研究模式。尤其对于编制语词索引的意义,他曾不无感慨地写道:“倘若此法能在上个世纪的这一领域得到普遍遵循,我们今天恐怕已经拥有了一部古藏文的基本词典。”<sup>③</sup> 事实如其所言,中国学者释读古藏文语词的不少缜密见解,由于研究方法的粗疏和撰述体例的局限,多被无形地湮没于汉文译文乃至个别注释之中。这些积累和思考的真知灼见,大都出自一种无法复制或移植的经验,更难见诸任何一部通行的藏文辞书。惟有真正能够沉潜进去的学者,在探究某一问题时的蓦然回首,方有机会豁然感悟到它们的存在。

PT 44 号写本原题 *Phur bu vi khungs// dang gtan tshigs*, 译言《金刚杵之来历及其教言》。此卷是涉及莲花生 (Padmasambhava, Padma vbyung gnas) 大师的传说故事,故而此次被收入“文学卷”中。罗秉芬先生对于此卷的译注和初步研究,<sup>④</sup> 乃是中国学者在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研究领域为数不多作品之一。道尔顿 (J. Dalton)、谢克 (S. van Schaik) 所编《英藏斯坦因收集品中的敦煌藏文密教写本解题目录》<sup>⑤</sup> 一书,已然成为西方学者致力于在此领域进行全方位探索的标志。此书的两位作者,以其先前关于藏传

① 安世兴《古藏文词典》,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20、215页。

②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Shangshu Paraphrase”, Part I – II,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111, No. 2 – 3, 1991, pp. 303 – 322, pp. 523 – 539.

③ W. South Coblin,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丁邦新主编《李方桂全集 9: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④ 罗秉芬《西藏佛教密宗本尊金刚杵的来历——伯希和藏文手卷 44 号译注》,罗炤等编《藏学研究文选: 祝贺王森先生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五十周年》,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76页。

⑤ J. Dalton & S. van Schaik,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 Boston: E. J. Brill, 2006.

佛教宁玛派 (rNying ma pa) 文献和教法的深厚学养, 鲜明地将敦煌写本视作研究藏传佛教密教传统形成史的基本资料, 先后发表了一系列信息丰富、颇具创见的论文。应当指出的是, “文学卷”误将 PT 44 号标题中的 gtan tshigs (教言) 录作 gtam tshigs, 此外罗秉芬先生将此词译作“原因”(《文学卷》, 第 240、242 页) 亦似欠妥。2008 年, 坎特韦尔 (C. Cantwell)、迈耶 (R. Mayer) 夫妇所著《敦煌所出关于金刚杵的早期藏文文献》<sup>①</sup> 一书, 对包括 PT 44 号在内的涉及金刚杵 (Phur pa) 仪轨的敦煌藏文写本作辑译和研究, 堪称近年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在此之后, 他们又陆续发表了数篇与此相关的论文。显而易见, 西方 (包括日本) 学界在继敦煌汉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暂告完结之后, 复又自觉和自信地占据了敦煌藏文密教文献研究的翘楚地位。比起这种高歌猛进之势, 国内的相关研究却仍寥若星辰、难成气象。这种惨淡经营, 或许能在中国年轻一辈学者手中得到改观。

《选辑》“文化卷”和“文学卷”的出版, 乃是郑炳林、黄维忠先生所热心推动的“敦煌吐蕃文献分类整理与研究”项目最先的两部成果。此外正在统稿或编纂者, 尚有“历史卷”、“社会经济卷”、“科技卷”、“愿文卷”、“碑铭卷”五部。值得优先说明的是, “科技卷”的主体实为藏医文献, 这是一个颇为专门的学科领域。2002 年, 罗秉芬先生所主编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sup>②</sup> 一书, 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敦煌藏医学研究的主流水准。尤需标举的是, 此书除附《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解题目录》、《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研究论著目录》两种之外, 另外编有五种体例颇好的语词对照索引 (藏汉对音、语词对照、专名列举)。纵观国内学界的已有成果, 能够采用这种研究方法者实不多见。即将出版的“科技卷”, 拟将《精要》全书收录其中并有扩充和增订。除此而外, 罗秉芬、刘英华先生对于噶塘所出藏医写本的译释, 亦将作为一种性质相同的平行资料纳入其中。切盼经过增订的语词索引能在“科技卷”中再现, 为国内敦煌藏文写本的科学整理和精细研究树立榜样。具有鲜明特色的“愿文卷”, 其初步的整合和结集亦值得期许。“丛书”主编之一的黄维忠先生, 对于敦煌藏文愿文作过全面的普查 (共计著录国内所藏 4 件、法藏 65 件、英藏 22 件、俄藏 1 件) 和整体的研究, 并曾辑译敦煌藏文愿文 14 篇 (写本 13 篇, 题刻 1 篇),<sup>③</sup> 已然形成一部按赞普序位排列的吐蕃愿文选集。作为一种内涵相通的文献, 吐蕃碑铭中的愿文资料亦将纳入其中。西方学者的藏文愿文研究至今尚显薄弱, 中国学者当然可以作出一份有力的贡献。

随着《选辑》其余各卷在今后几年内的陆续面世, 中国学者的研究经验和积淀亦将整体展现出来。对于既有研究成果所作的有规模的整合, 已在悄然激励着年轻一辈学者继踵其后、迎难而上。近年以来, 西藏菩日文书、噶塘文书以及甘肃凉州文书、宕昌

① C. Cantwell & R. Mayer, *Early Tibetan Documents on Phur pa from Dunhuang*,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8.

② 罗秉芬主编《敦煌本吐蕃医学文献精要》,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③ 张云、黄维忠《唐代吐蕃资料选辑》, 北京: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2005 年, 第 321-446 页。

文书的陆续发现令人瞩目。其中噶塘文书，已经实现了图版和录文的完整刊布。<sup>①</sup> 内容浩繁的宕昌文书，亦于最近以 30 册的巨帙影印出版。<sup>②</sup> 这些新出文献的部分或全部，就其文字形式、内容风格乃至思想状态而言，均与敦煌藏文写本存在相当一致的时代特征，构成相关研究不可多得的横向比较材料。截至目前，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丛刊所收《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已出 12 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已出 2 册。诚如王尧先生所言，基础资料已经“灿然大备”。敦煌藏文写本以精美图版的形式回归祖国，为更具规模、更有深度的研究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对于中国学者而言，以往“礼失而求诸野”的无奈已经一去不返，网络工具的普及更是大大加速了这一进程。然而仍需正视的是，这些并不意味着研究水准就能相应与时俱进、超迈国际。时代呼唤中国新一代的敦煌藏学研究者，尊重并赓续老一辈学者的持守精神和学术优长，在研究资讯日益多元化和便捷化的条件下，以综合性、多视角的方法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以此推动敦煌藏文写本研究的整体进步。在此过程中，惟有具备广阔的胸襟和缜密的眼光，同时兼具语文素养和学术视野两把钥匙，方有潜力真正“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逐步趋近这套《选辑》的编纂者们心中的愿景。

① Pa tshab Pa sangs dbang vdus & Glang ru Nor bu tshe ring ed. , *gTam shul dgav thang vbum pa che nas gsar du rnyed pavi bon gyi gnav dpe bdams bsgrigs*, lHa sa: Bod ljongs bod yig dpe nying dpe skrun khang, 2007.

② 洲塔·洛桑·灵智多杰主编《甘肃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献》第 1—30 册，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1 年。